

上 编

翻 译 广 论

第一章 绪论

人类进入一个新世纪，科技界和学术界虽然面临种种困惑与挑战，但都以乐观的态度展望未来。翻译界也不例外，翻译学的讨论在上世纪末，虽然经历了一段沉寂，但始终是人们热衷的探讨课题，而且形成方兴未艾的趋势。

科学史向我们展示，建立一门新学科，大凡有三个先决条件：一是必要性；二是目的性；三是方法论。翻译学早在半个世纪前被文化名人所提出，但由于客观条件和时代的局限性，他们的大声疾呼，也毕竟已付诸东流。那么，到了今天，世界成为“地球村”，信息成为人类赖以生存的必需品，翻译理论能否脱颖而出，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确实是各国翻译工作者不可回避的问题。学科的建立，一靠导师引路，二靠群策群力；因此，笔者谨愿在名家崇论宏议之间，收集发表或未发表的言论，整理成册，以《新译学论稿》的名目，奉献给读者。

“翻译学是研究翻译的科学”，从多数学科的定义类推出一个界说，倒是不难。但要科学地去研究一种事物，恐怕首先得认清该事物的基本属性。翻译究竟是什么？这个基本问题当先解决。有的学者认为，翻译没有基本属性，既是技巧，又是技术；既是科学，又是艺术。问题搞复杂了，反而使人们对翻译缺乏实质上的认识，也就难以找到科学研究的基本出发点。正因为如此，翻译理论长期停留在抽象的泛泛议论上，甚至于产生一系列自相矛盾的空洞理论。例如：“翻译必须表达原文的词语”；“翻译表达原文的思想”；“译文应当读起来像原文”；“译文应当读起来像译文”，

“译文应当反映原文的风格”；“译文应当具有译文的风格”；“译文可以对原文增字减字”，“译文千万不可对原文增字减字”。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像这样一些自相矛盾的理论，确实叫人莫衷一是，还怎样去建立翻译学呢？因此，笔者在开篇以及后续几篇中，先对翻译的实质展开讨论。

翻译是什么？词典上说：翻译就是把一种语言文字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简言之，翻译是一种双语行为。笔者以为，就狭义而言，这也似乎无可非议。但是就广义而言，则并非如此。翻译的实质究竟是什么？我们还得从它自身的产生和发展去研究，才能看清其庐山真面。

众所周知，人类摆脱野蛮的第一步是制造工具，使用火，运用语言进行交际；然而文明的诞生却在都市社会的产生和文字的使用之后。从此，语言作为一种社会力量，伴随着人们的社会实践和生产实践，推动着人类的进步和发展。几乎就在人类文明开始向前迈出第一步的时候，翻译即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产生作用了。人类有近五千年的文明史，也就有近五千年的翻译史。历史的见证就是两个世纪以来展示在大英博物馆埃及雕刻厅的罗塞达碑（the Rosetta Stone）。在这块高 114 厘米，宽 72 厘米，厚 28 厘米而重达 762 公斤的石碑上，以三种书体刻着埃及文和希腊文两种文字。传说亚述古国的国王萨拉贡是一个好大喜功的人。他征服了很多民族，要各民族用他本族语言歌功颂德，由此可见翻译已成盛事。不过这只是传说而已。史学提供的依据才更有说服力。而史学告诉我们：从巴比伦文明到爱琴文明，再到古罗马文明，社会的发展几乎都是借助翻译而推波助澜的。以后接踵而至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产业革命直至今天的“第三次浪潮”，每一个发展阶段，无不打上翻译作为促成因素的烙印。

在此其间，与旧大陆遥隔的美洲大陆曾产生过光辉灿烂的马雅文明，阿兹台文明和印加文明。然而，在巴比伦文明诞生之后，

直到所谓“新大陆的发现”两个半球之间烟波浩渺碧空万里，交流不了文明信息。结果，那也许比旧大陆还要略胜一筹的高度文化只能成为历史的陈迹。这不能不说是全人类的一大憾事！

人类文明史是一面镜子，让我们看清了自身进步的各种促成因素。翻译本是一种巨大的社会力量。对此，就连上古之民也有所知。《旧约》中“通天塔”的典故就是一个例子。据《创世纪》第十一章，诺亚的子孙后来在西纳尔定居，烧砖制瓦，建成城市。他们还企图对上帝的神威挑战，建起一座通天塔。这可触犯了天庭。上帝有知，人类如此强大，主要是因为他们同操一种语言，因此获得集思广益，通力合作的威力。于是，上帝把诺亚的子孙后代驱散到世界各地，并使其语言各异。从此，全人类便失去合作的力量。翻译之所以是一种巨大的社会力量，是因为翻译实质上是两种语言之间的信息传递和两个语族之间的文化交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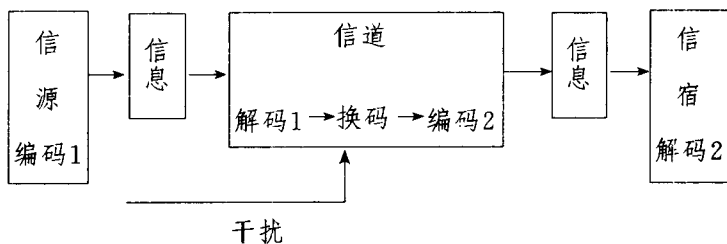
每一事物，每一过程的矛盾都各有其特殊性。当前，早已进入“信息时代”的人类越来越依赖信息传递与文化交流以求生存。上世纪后期，电讯、广播、电视等现代化手段已使远隔重洋的东半球和西半球不再是烟波浩渺、信息不通的两个世界，而成了“鸡犬之声相闻”的近邻。人类进入新时代，因特网把这种传递和交流推到息息相关的程度。世纪之交的“千年虫”恐慌，不是搞得大家人心惶惶吗？储户纷纷去银行取款，家庭主妇匆匆去商店购物，旅游者只好暂时压抑雅兴，滞留家中。虽然是一场虚惊，却反映了信息传递与文化交流的迫切。翻译活动是当今世界人类社会实践的客观存在。建立翻译学的必要性也就不言而喻了。

翻译伴随人类文明的发展而发展，人们逐步认识到它的规律性。从中外翻译理论首先都强调“忠实”这一点来看，就说明大智所见略同。科学的发展表现出明显的继承性。这种继承性发展在我国尤其明显。有的学者曾用“案本——求信——神似——化境”来总结我国传统翻译理论的概貌。中国翻译协会成立以后，翻

译界一方面引入西方翻译理论，一方面发展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出现了新理踵出的局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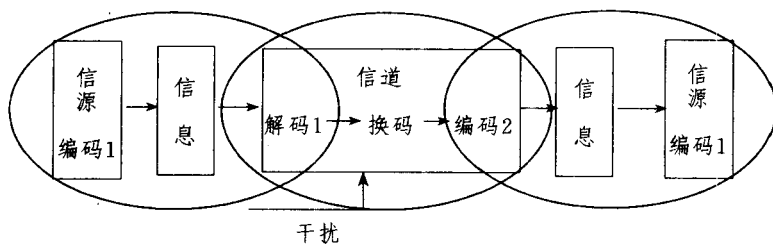
任何事物都不能孤立地存在与发展。外部原因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翻译理论之所以发展到今天，这是因为其他相邻学科对其产生影响和配合的结果。但是，由于翻译理论一直不受人重视，甚至其本身的存在都受到一些人的否定，其发展是缓慢的，而没有重大突破。世界上有些事情就是这样。例如阳光、空气和水这生命三要素，因为人们天天接触，反而被忽视；所以环境污染渐渐危及全球。到今天，人们才去研究生态平衡的理论。我们今天认识到翻译的实际价值，认识到建立翻译学的必要性；那么，客观条件又怎样呢？客观条件是，与翻译学相邻的学科，如语言学、社会符号学、文艺学、人类学、语言学、哲学等等，却有很多重大突破。这些学科的发展与其他新学科的产生都在于理论研究有明确的目的。翻译学的明确目的是什么？我们认定翻译是两种语言之间的信息传递和两个语族之间的文化交流，翻译学的目的就是研究这种传递和交流的客观规律以及翻译实践的原则与方法。我们先来探讨信息传递的客观规律。

按照信息论的原则，信息传递大致有编码，传送，解码三大过程。但是翻译是一种特殊的信息传递，涉及两种语言系统的换码问题，其过程如下图所示：



建立翻译学的目的就是研究这个过程，排除信息传递中的种种干扰，确保原语（the source language）信息的内容和特质在译语或的语（the target language）中不失真地再现。要解决不失真的问题，要考虑的因素很多，故前人称译学为“杂学”。建立翻译学，就是要解决杂而无章的问题。面临种种复杂的因素，我们要综合地，精确地去考虑研究对象，以达到最佳的处理。这种办法叫做系统方法。翻译学能否运用系统方法，这取决于翻译本身是不是构成一个系统过程。

笔者认为，回答是肯定的。何谓“系统”？我国学者钱学森先生认为，系统就是“由相互作用和相互联系的若干组成部分结合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整体”。换句话说，系统是由两个以上要素按照一定方式组成的，这叫做系统的“集合性”；同时，各要素之间都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这叫做系统的“关联性”。以上述两大主要特点为依据，我们首先分析一下翻译的全过程。笔者认为，翻译的全过程实际上由三大环节组成。从“编码1”到“解码1”是第一环节，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理解阶段”。从“解码1”到“编码2”是第二环节，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转换阶段”。从“编码2”到“解码2”是第三环节，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译语表达阶段”或“接受阶段”。上述三大环节如下图所示：



从图示可以看出，三大环节相互重叠意味着相互之间的联系与制

约，这就明显构成一个系统，而其中心环节又是中间的换码过程。

笔者认为换码过程是关键，因为在此过程中，信息的传递受到的干扰最多，也就是说，要考虑的因素最为复杂，如果处理不当，就难免信息失真。由于任何一种语言绝大多数的符号和意义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构成一种特殊的符号系统；这就给换码带来复杂情况。建立翻译学的目的就是要对种种情况进行分析，以便得到最适宜的处理方案。那么，语言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特殊符号系统呢？这涉及到语言的实质问题。当代语言学家们对语言下过各种各样的定义。从翻译的角度来看，笔者倾向于接受一个较全面，较科学的定义：“语言是人类特有的一种符号系统，当它作用于人与人的社会联系的时候，它是表达反应的中介；当它作用于人和客观世界的关系的时候，它是认知的工具；当它作用于文化的时候，它是文化信息的容器和载体。”

语言是一种特殊的符号系统，其特殊性在于：语言是人类特有的，语言是有层次的，语言具有聚合关系和组合关系，所有语言基本结构相似等等。根据上述特征，我们可以建立起人类语言具有可译性的基本观点，从而树立起翻译学可以建立的信心。但是，语言既是“中介”，又是“认知工具”和“文化信息的容器和载体”，这就说明语言的多功能性。翻译是一种双语行为，因此，翻译不能完全以“信、达、雅”等几条简单的标准或原则作为实践的准绳和依据。建立翻译学首先应当把翻译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整体，它所研究的应当是这个整体与其相邻学科的关系，以及各相邻学科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从翻译学本身的理论结构来看，也应当视为一个系统，也只能用系统方法从事翻译理论研究，来建立翻译学。由此看来，建立翻译学的第一步是理清究竟哪些学科应当作为其分学科。

笔者认为，我们可以依据上述关于语言的基本定义，顺藤摸瓜，来找这个系统的网络。我们既然认识到语言在作用于人与人

关系时是表达相互反应的中介，那么就应当研究影响这一中介的各种因素。因此，我们必须将普通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应用语言学、社会符号学等纳入翻译学的研究范畴。我们既然了解到语言在作用于人与客观世界时是认知的工具，我们就不能不将语言学、哲学、心理语言学、人类学、美学、逻辑学等纳入这个体系进行综合研究。语言还是文化信息的容器和载体，那么，社会文化学、语文学、文学、民俗学等也应规划在这个网络之中。

翻译学虽为“杂学”，但理清关系就不会杂而无章。翻译学是一个总纲，应做到纲举目张。面临庞杂的事物，只能用科学的方法去处理。建立翻译学的方法论就是前面所提及的系统方法，因为这种方法符合实际，而且具有以下显著的特点。

首先，将翻译学作为一个整体，研究的目的性强，形成的理论更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关于目的与目标，上面已详，不作赘述。建立翻译学的第一阶段，应当冷静分析整体与局部（即分学科）的关系，逐步勾画出翻译学的网络结构或理论框架。关于翻译学的内容结构，不少学者已提出了初步设想。笔者以为，其内部结构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翻译理论，翻译途径，翻译实践。而三个方面都应当围绕翻译的实质和具体而又明确的目标来展开和深化。

第二，系统方法就是解决最优化问题。最优化历来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一贯要求。由于翻译这种特殊信息传递涉及的因素很多，关系网络盘根错节，因而实现原信息“再现”的途径和方法是多种多样的。英国纽马克提出了两大途径：语义途径和交际途径。美国奈达提出了五大途径：继语文学途径，语言学途径，交际学途径和社会符号学途径后又提出了功能途径。至于方法和技巧，那可就五花八门了。翻译学的建立就是解决综合治理的问题，也就是在种种选择面前解决最优化问题。在这方面，我国翻译界也有不少尝试。例如在 80 年代初期，吴新祥和李宏安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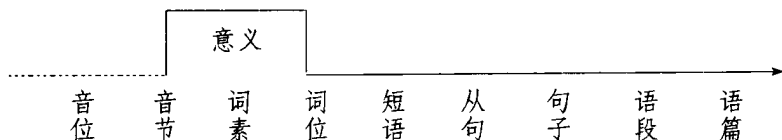
先生所提出的等值翻译观就是十分可取的。他们提出将语言分成静态和动态平面所构成的 15 个层面，再以舍小求大的原则探索动态等值的实际问题。这是富于开拓性的见解，也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笔者曾运用这一途径解决翻译的一些实际问题。

第三，系统方法充分体现了辩证论译的观点。笔者认为，辩证论译是翻译学这门独立学科的灵魂。无论从翻译三大环节来看，还是从语言各个层次来看，都是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只有掌握辩证论译的原则，才能处理各种矛盾，解决最优化的问题。

从翻译过程的三大环节来看，我们虽然确认在一般情况下，“换码”是中心环节，或者说是问题的关键。但在一些特定的条件下（或用系统论的观点来看，为适应一定环境），前后两个环节同样可能成为中心环节或关键环节。例如翻译侧重于原文的思想内容时，译者就会倾向于“理解”这一环节。在具体做法上，他自然信守“宁信而不顺”的原则，尽可能采用直译手法，使思想内容和语言表达尽量统一，有时怕有损于原文意旨，甚至干脆不译，完全采用文化渗透的方式进行音译。唐玄奘的“五不译”原则就是如此。音译法的沿用历时已久，从“阿弥陀佛”到“艾滋”已有千多年的历史，不能不说这还是行之有效的方法之一。

相反，如果翻译侧重于信宿，即“表达”这一环节，着重考虑译品服务的对象，那么，译者在真正吃透原文精神实质之后，则不必死守“不增不减”的教条，而可以“依实出华”，“重神似而不重形似”，以达到“化境”。英若诚先生翻译莎剧，是为中国戏剧舞台服务的。《请君入瓮》的上演应归功于他。谁认真读读译文，就会发现译文与朱生豪先生的译本大不相同。英先生的译文除语言更接近当代之外，还整段删掉不少。但如果用朱先生的译本去排演，只怕会票房冷落。文学艺术的翻译除再现原文信息内容外，还必须具有美的感染力，否则，翻译还有什么价值可言？因此，处理三大环节，就有一个辩证论译的问题。

从语言结构层次来看，意义是随语言层次上升而产生和逐渐明确的，其势如下图所示：



图中虚线部分表明该层次基本上没有意义，因为符号和意义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从音节到词素之间，才可能有明确的意义出现；而后，意思越来越明确。因此，在翻译的一般情况下，往往要舍小求大，也就是原文的信息在同一个层次的译语找不到对等语时，可以在高一级去找对等。但在一定的条件下，低层次也可能成为信息的核心部分，王国维评“红杏枝头春意闹”，认为“闹”字托出全词的意境。因此，翻译也不可一味地舍车保帅，否则，就会损害主旨。例如翻译肯明斯的十四行诗《夕阳》，托出全诗意境的是最后一行，即词素—s。再如翻译拟声词，音位也就成为信息的核心部分，当然是翻译的重点。综上所述，我们无论从哪个角度从事翻译，都必须强调辩证论译。

新时代的宇宙观告诉我们，系统无所不在，无时不有。自然科学是如此，社会科学也是如此，科学理论更是如此。一切事物都具有质的规定性，而事物的质又总是同事物的结构性密切联系的，即与结构各要素的一定组织形式密切联系的。因此，事物的质并不简单地组成其要素的总和，而是它们整体和完整性的体现。翻译学不仅是一个系统，而且是一个庞杂的系统。建立翻译学也是要建立一套对译文综合地进行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的系统方法。从整体出发，对翻译活动内在结构和外在联系，对每个层次和种种规律性加以综合研究。

建立翻译学显然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靠一个人，甚至靠一代人，也许不能做到尽善尽美。但莘莘学子贵在追求。大千世界，黑洞假说，奇点理论，天外生灵，如此等等，恐怕到新世纪末也未必有明确的结论；但人类并没有因此放弃研究，仍然在上下求索。笔者以为，翻译学的建立毕竟没有那样艰难。所以不揣冒昧，将近 20 年来的一些想法整理出来，作为引玉之砖。

第二章 论科学的翻译与翻译的科学

翻译，这种称为“杂学”的研究和实践活动，早已是中西学术界的热门话题。它之所以如此热门，一是因为世界进入信息时代，翻译成为现代人类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二是因为人们对其本质特征和研究途径众说纷纭，迄今不能像对某种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的原理那样，达到翕然首肯的共识。

纵观我国翻译界，翻阅主要学刊，人们对翻译界各派的对峙所造成翻译理论莫衷一是的局面感到困惑。科学史表明，学派对峙常常是科学发展的一种动力。比如，天体物理从地平说到地圆说，从相对论到黑洞说再到奇点说，大致是科学的新发现和学派别的对峙而促成的。社会科学以语言学为例，没有学派的对峙，描写主义不会针对规定主义而产生，功能主义也不会针对结构主义而问世。不过学术争论要观点明确，旗帜鲜明，这样才能避虚就实，切中要害。为了表明自己的观点，笔者还须对本章的命题，略加界定。

本章所言“科学的翻译”中的“科学”有两个含义：一是指“合情合理”。例如我们汉语讲“你的说法不科学”这是取此第一义。二是指“符合科学规律”，例如说“你的研究很科学”这是取此第二义。本章所谓“科学的翻译”是取“科学”的第二义。而所言“翻译的科学”中的“科学”只有一个含义，即：“反映自然、思维等客观存在规律的分科学的知识体系。”

翻译的实质究竟是什么？不少专著和论文从多维视野，作出种种表述，摘要如下：

翻译是科学；
翻译是艺术；
翻译是技巧；
翻译是技术。

稍微进行一下修辞分析，我们不难看出，上述表达都是从某一个角度来谈论翻译的某个方面的特征，而且修辞上采用的是隐喻格。如果进而补益，便可以这样释义：

翻译是科学，因为它有客观规律可循；
翻译是艺术，因为它富于创造性的方式；
翻译是技巧，因为它靠实践而获得；
翻译是技术，因为它可以凭经验和知识加以操作。

从逻辑学的角度加以分析，上述表达不合定义法，因为定义法需要三大要素：命题、属性和特征。句法要用判断句，而不能用词格。所以，上述表达不能成为翻译的明确定义或完整的定义，而只能表述翻译某方面的性质；当然也无法揭示翻译的本质。因此，笔者倾向于取翻译界同仁大致可以接受的观点，将翻译界定为：

翻译是语际之间的信息传递和语族之间的文化交流。

本书绪论从中西翻译史阐述了这一观点的依据。从社会语言学来看，翻译也具有这种本质属性。社会语言学家认为，语言是一种社会力量。那么，翻译是一种双语活动，也应视为一种社会力量，一种作用于语族之间的文化动力。回顾我国在上一个世纪天翻地覆的变化，翻译的社会力量是难以估价的。所以大家认为，翻译虽然不是自然界的客观存在，但它是社会大千世界的客观存在。正因为如此，古往今来，一直有人去认识它，研究它。翻译理论就这样创立起来。遗憾的是，不少人有一种“过河拆桥”的心态。翻译本来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无声无息地把人类文明推向当代水平，而其自身却因为太不显眼而遭冷落，甚至遭咒骂，背

上“翻译扼杀文学”等等罪名。因此，在社会科学中，早有响当当的哲学、法学、经济学、伦理学等等，现有时髦的公关学、交际学等等；就是没有翻译学。人类步入当代社会，人们才真正醒悟过来，想起了过河之后所遗忘的桥，于是大声疾呼，要建立翻译学！

这种醒悟自然是件好事，虽然为时太晚。翻译理论的雏形虽然问世于多学科之前，然而由于长期受歧视，演变和发展十分缓慢，不可能像其他学科达到基于以科学为特征的成熟阶段。人类思维方式大抵经历了四个阶段：原始思维方式；然后是经验思维方式；接着是近代思维方式，即以实证为特征的思维方式；现代思维方式，即以科学想象为特征的思维方式。中西翻译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恰和人类思维方式相应同步。

我国的翻译活动虽然始于古代文明之初，但理论的形成是在佛经翻译之后。社会科学的产生离不开当时的学术背景。翻译理论也是如此。因此一开始便深深地打上训古和阐释的烙印。众所周知，佛经传入之前，我国就有辉煌的中华元典。而且具有深刻而广阔的原创性意蕴，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长期发挥精神支柱的作用。正因为如此，中华民族世代不断继承和发掘，因此产生了训古和阐释。佛经是印度元典，通过翻译，引入中国，丰富了中国的思想文化。这种翻译是以训古和阐释印度元典为目的的，所以翻译理论就脱离不了“案本而传”、“求信为本”的窠臼。由于古代翻译大师们对元典抱有虔诚的态度，惴惴然惟恐背经离道，一般都采用直译法，甚至文化差异太大之处坚持“五不译”原则而采用音译法。

在西方，较早的典籍翻译是《圣经》（即希伯来元典）的翻译。最早的翻译大师对元典所持的虔诚态度，比我国佛经的译者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认为：《圣经》翻译是神圣的，译者单凭精通两种语言而无神的感召，便不能从事翻译。按照这种观点，

几个译者翻译同一部典籍，译品不会有差异，应当一字一句相同，好比听写一样。

从上述史料，我们可以看出，原始思维方式是原始翻译理论的根基。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翻译活动从元典扩大到文史哲。翻译经验的积累以及经验主义哲学思想的萌生，使翻译理论进一步演变。在西方，直译与意译之争发生于文艺复兴时期。人们追求更完美的译品，于是摆脱了“神的感召”，提出了新的翻译原则，把翻译理论提高到新的水平，即使是对元典的翻译，也开始讲点大众化。如马丁·路德的翻译七原则就摆脱了死抠字眼的陈规，开始讲究文从字顺而去调整词序，增补结构，变换词格了。这种经验译论到 18 世纪末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其标志就是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

- 1) 译作应完全复写出原作的思想；
- 2 译作的风格和手法应和原作属于同一性质；
- 3) 译作应具备原作所具备的通顺。

康德的实证主义思想对西方学术界是有深远影响的，当然也渗透到翻译界。翻译理论家又对经验译论进行思考，对已成定规的翻译原则提出质疑，认为翻译不可能完美地再现原作的面貌，因此翻译必须靠创造。同时，可译性和不可译性的问题也成了翻译界讨论的课题。这种学术对峙又使翻译理论向前大跨一步。

由于我国长期的封建闭关自守，上述西方的翻译理论演变过程几乎压缩在上个世纪 100 年的跨度之内。严复的“信、达、雅”几乎与泰特勒的三原则异土同宗。“神似”论与“化境”论可谓经验译论之上乘。新中国建立后的翻译理论，多少受仿苏和反修政治浪潮的冲击而徘徊不定。真正的演变是在改革开放之后。例如黄药眠的“透、化、风”原则和刘重德的“信、达、切”原则都有演变的痕迹，而为翻译界所推崇。

通过对翻译史的简略回顾，我们可以看出，中西翻译界历来

在追求合理的翻译原则，早已不是什么“翻译无定规”的局面。只不过各家有各家的规则而已。翻译理论还没有形成完整的知识体系。翻译也就只能做到合情合理，而谈不上科学化。

人类的需要是一切科学产生的源泉。没有启蒙运动和产业革命的时代背景，牛顿大抵不会由于苹果落地而想到万有引力。人们一旦有需要，就会萌发科学的想象，随后，新科学就破土而出。我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确立，使科学界和社会科学界新理论、新学科丛出。例如“公共关系”，大抵是改革开放之后的产物。没有几年时间，就出现了公共关系学，而紧接着又出现其分学科：“科技公共关系学”、“公关英语”之类。这些新学科顺利问世，也许一是因为与物质文明直接挂钩，实效显著；二是因为脱颖而出，无因袭势力的束缚，因此就很少有人去质疑，去反对。而多少带有传统色彩的学科，往往难以确立。但是事物的发展毕竟不会按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信息已逐步成为人们认识世界的基础，成为现代社会生产和生活的一种资源。国际间的信息交流把人类带到“翻译时代”。

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纽马克是这样描述“翻译时代”的特征的：“现在，各国公司之间所缔结的协定全部译成各有关方面的文字，不管签字的人是否相互懂得对方的语言。新的国际组织的建立，多国公司、多国共同体的组成，都增加了翻译的重要性。工业技术的突飞猛进，把技术推广到发展中国家的尝试，技术文献用各种文字同时发表以及全球信息交流的日益频繁，这一切都使翻译显得更加重要。”不言自明，那时候翻译已经不再乐于训古和阐释，也不仅仅只是异国文学的玩味与体验，而成了当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首要基础之一。30 年后的今天，就世界而言，信息成了“地球村”息息相关的纽带；就国情而言，中国即将进入世贸，我们还能对翻译这座信息传递的桥梁另眼相看吗？

翻译活动既然把范围扩大到史无前例的程度，渗透到各个领